

长篇纪实文学

母亲为什么离去

一位母爱缺失者的自我治愈史

Nancy Rappaport

〔美国〕南希·拉帕波特 著 赵文娟 译

In Her Wake

—— A Child Psychiatrist Explores The Mystery of Her Mother's Suicide



译林出版社

母亲为什么离去

〔美国〕南希·拉帕波特 著 赵文娟 译

Nancy Rappaport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为什么离去 / (美) 拉帕波特 (Rappaport, N.) 著;
赵文娟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8

书名原文: In her wake: a child psychiatrist explores the
mystery of her mother's suicide

ISBN 978-7-5447-3843-9

I. ①母… II. ①拉… ②赵…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
—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95238号

- 书 名 母亲为什么离去
作 者 [美国] 南希·拉帕波特
译 者 赵文娟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杨 莉
原文出版 Basic Books,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27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843-9
定 价 32.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妈妈和我的家人

致 谢

感谢科林·弗拉文，他给了我难以言尽的安慰。

许多个深夜，当我的家人已经入睡，我写着这个故事，试图去理解我的母亲。这是为了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他们的外祖母。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母亲跨越了时间的洪流活生生的就在我眼前。她错过了与我的三个孩子一起的生活，是他们教会我如何成为一名母亲。我深深地爱着他们，这帮助我深刻地理解了在冗长的监护权争夺期间，当我的母亲以为她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时内心的感受。

感谢我的妈妈。

感谢我的爸爸，我会永远感激你给我的爱与鼓励。感谢菲莉斯，她一直给予我和我的家人支持。

为了弄清母亲的情况，我采访了许多人，他们仁慈地容忍了我那永不知满足的好奇心。佩吉·穆伽德，四十年来一直保存着我母亲的物品以及她的小说，我对此无比感激。感谢伊莱恩·沃拜、夏洛特和迈克·亚历山大、艾德·英格里仕、罗伯特·拉梅尔、芭芭拉·怀特希尔、克洛蒂尔·拉森、温伯格医生、多萝西·纽厄尔以及迪克·西尔斯，他们为我的故事提供了细节。感谢芭芭拉·拉帕波特，她对我的手稿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且慷慨地献出她的时间，对其进行了严格的编校工作。感谢我的兄弟姐妹理解我的孤立无援，并带给我数不清的回忆。感谢安德鲁，每一次我

想起的一切都是泪水时，是你让我展露笑颜。我记得那时候你安慰我说：“坚持就是胜利，否则图书馆里就只有空书架了。”感谢吉姆，他以关爱之心精细地核查了我的作品。感谢玛莎，她给了我1965年至1966年间的家庭旅行日志，并给我鼓励。感谢我的姐姐艾米。

作为一名儿童精神病学家，多年来，我领会到了孩子对他们的父母有着怎样一颗狂热的忠心，但我写这本书，不仅仅因为这一点。当我们能够构建起一种良好的沟通，这种反思的能力便是一种力量之源。我们经常被迫忍受一些不该有的心痛的折磨。感谢我的病人，他们的幽默、智慧与勇气一直鼓舞着我。

我的朋友们让这本书成为可能。感谢梅勒妮·布莱，他总让我觉得自己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诉说。感谢珍·罗兹，当我感觉迷失在千头万绪中时，她带着恻隐之心帮助我变得积极起来。她还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感谢凯利·沃耶沃兹克，他总是鼓励我继续下去并带给我欢乐。感谢玛吉·阿里希亚、博比·德阿里桑德罗、安·派克以及卡罗拉·苏亚雷兹·奥伦兹柯。感谢塞西·洛佩兹和埃勒·克鲁兹。感谢达玛瑞斯·洛佩兹。

感谢陪我一路走来的小伙伴，佩妮和约翰·林奇，我愿意每一天都雇用你们做我的保镖。感谢我强大的瑜伽团体，在那里给自己重新充电，已经是这样的旅途之中所必不可少的。感谢沃夫伯格医生，他鼓励我进行探索，并一路陪在我身边。

感谢伊莱恩·马克森和加里·约翰逊。热情而睿智的伊莱恩是我的守护天使，引领着我完成这本书。感谢阿曼达·莫恩，当我需要打磨我的文字时，发现她是个了不起的编辑。感谢惠特尼·卡斯在细节方面的关注。感谢校对克里斯汀·雅顿和基础图书公司的产品编辑米歇尔·威尔士-霍斯特。感谢美术编辑

妮可·卡普托和詹妮弗·卡洛，她们设计出的封面抓住了我作品的精髓。感谢莎拉·崔恩整理与找到必需的参考文献的能力，她阅读和验证手稿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人都多。感谢亚莉克莎·吉欧瓦诺斯，她为我录入了给“亲爱的妈妈”的信的原件和法庭的判决书，我自己可无法完成这些。感谢玛丽·巴杰尔给我自信，去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感谢我才华横溢的朋友艾莉森·哈里斯。

感谢我的读者佩里·克拉斯、康妮·比瓦尔德、安妮·格林、吉尔·阿尔卡维、安迪·克拉克、温迪·戈登、保拉·劳赫、德布·库利克、山姆·海因斯、米莎·斯托亚诺维奇、蕾切尔·纳丁、吉姆·吉利甘以及珍·弗雷泽。感谢我哈佛大学一年级研讨班的学生（2006—2008）。

感谢杰伊·伯克，剑桥健康联盟，给予我职业生涯根基的青年健康中心，以及剑桥的公立学校。

最后，感谢我的所有读者，谨以此书献给你们。

给读者的一则附注

为了保护一些书中所涉之人的身份，我对他们的生活情况及性格特征做了一些象征性的等效替换处理。

第一章

我们将永不停止探索
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
将是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
并且是生平从未知道的地方。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小吉丁》

那一天，我的母亲自杀了，在此之前，她刚刚装修好了地处马尔伯勒街的房子，准备迎来她与父亲激烈的监护权官司之后的战利品——六个年幼的孩子。我的姐姐艾米，当时才九岁，她还记得母亲问我们希望把房间装饰成什么风格。艾米希望她的房间像一条船，母亲就给房间装上了架子和窗帘，还真像船帆在海浪中飘舞。外祖母也要搬来跟我们住，她住在三楼的豪华套间。我不知道我的房间在哪儿，或许是靠近母亲卧室的那个最小的房间。我那时刚刚满四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这是一幢上世纪建造的老房子，有十四间客房和五间半浴室，偌大的房子里只住着我的母亲和她的新丈夫亚历克斯。房子所在的街道绿树成荫、环境优美，附近是波士顿公共花园。母亲在她的装修笔记中记录了她希望把每个房间都设计得高雅不凡且具有

特定功能，有可用于聚会上烤乳猪的八角宴会厅，有足够多带壁炉的卧室，有给六个淘气孩子送饭菜的升降机，有专门的配餐室，有带光洁厨具的宽敞厨房，在房子的各个楼层之间还有对讲系统。在 1963 年这些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而且，房子里还有宽敞的壁橱，孩子们可以尽情地在里面玩捉迷藏；此外，设计考究的楼梯蜿蜒着通向僻静的后花园。

就在 1963 年 9 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惠特莫尔接受了父亲要求保留子女监护权的上诉，因此我们预期的回归被搁置到听证会以后。最终，我们都没能回到母亲身边。

母亲和她几个月前所嫁的新丈夫，将成为守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仅有的两个人。我可以想象到，母亲听到法官惠特莫尔的裁决后，肯定是不寒而栗，她失望透顶，霎时间面无血色，身体垮下来，踉踉跄跄地从一个房间奔到另一个房间，淹没在那片无边无际的死寂当中。

家里人都说，我是母亲自杀之前见到她最后一面的人。那天，她开车来到父亲家，乞求见见自己的孩子们，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当时，我是唯一在家的孩子，好心的管家比，把我推出了门，顺着车道一直送到了在街上绝望等待着的母亲面前。我依稀记得，母亲弯下腰，轻轻抚摸我的头发，低声嘱咐比好好照顾她的几个子女，尤其是年幼的我，然后她就黯然离开了。

她留下了一封遗书和一张购物清单，清单上写着：六个橘子，两盒舒洁面巾纸（粉红色被划掉，改成了蓝色），无糖麦根啤酒，蓝色卫生纸，四磅烤牛臀，生菜，西红柿，一大家人的食物……这份清单本是为我们的到来准备的，却永远也用不上了。

经常有人问我是否还记得母亲。我心里明白，人们在问这个

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失去母亲给我带来的伤害已经被冲淡，因为至少我可以通过她的照片、项链，或是她的只言片语来唤起对她的回忆，从而得到些许慰藉。不过遗憾的是，母亲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纪念品，在我心中留下的记忆更是少得可怜。可以说，母亲在我的生命中始终是缺失的。

是的，母亲留下的有些纪念品确实可以点燃我对她的记忆，譬如一张精致的出生证明纸，上面盖着我的出生日期的戳印；一个已经褪去光泽的银质婴儿杯，边缘刻着我的名字；一张我孩提时代用过的羊毛毯子；还有一个母亲在波士顿学生会参加竞选时留下的宣传册。此外，我还有母亲的一些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她在三十岁左右时由专业摄影师拍摄的肖像照。照片中，她看上去非常自信，留着时髦的短发，完全是一副将生活掌控得游刃有余的女人的模样。她穿着一件镶嵌着大纽扣的黑色羊毛套装，颈部的衣领看上去高贵典雅，恰到好处地露出绕在脖子上的大珍珠项链。她凝视着镜头正上方，也许她那时正愁肠百结。她的眼神凝重而又冷漠，流露出一种高贵逼人的气质。在我转而去观看自己三十岁的照片时，我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有时会让我不寒而栗。

几张照片，一块破旧的羊毛毯，一只婴儿水杯——这些就是母亲去世后留给我的全部物品。在我年幼的时候，我还以为一场大火摧毁了她所有的物品。然而父亲却告诉我说：“亚历克斯是不会交出任何东西给孩子们。”^①

我和母亲共用一个名字——南希。我仍然模糊记得，我曾和母亲坐飞机旅行过。那天天气很热，我梳着小辫子，穿着一

① 杰罗姆·拉帕波特，个人访谈，2009年2月3日。

条飘着长长的红丝带的蓝白条海军服，从飞机上下来走到停机坪时，我感到恶心反胃并呕吐起来，是母亲握着我的手帮我擦干净了脸。

我有一些旧报纸的复印件，上面有关于我母亲的文章，是我们十来岁时姐姐朱迪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缩微胶片中找到的。我们对于母亲的好奇心是秘而不宣的，仅仅是在姐妹之间流传。这些文章让我了解到了有关母亲的生活、父母的婚姻、离婚、争夺监护权的一些细节。父亲对母亲鲜有提及，因此母亲之于我们是一片空白，然而这些文章却将我们的过去拼凑成令人难以理解的肥皂剧版本。

在朱迪的收藏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1963年9月17日的当地报纸的头版，上面刊登了母亲一张很漂亮的照片，文章的标题非常醒目，短短几个字占了整整两行：

社交名媛自杀身亡 留书两封：惧怕失去年幼的子女

结束迷惘人生

详细报道：

拉帕波特家子女监护权争夺一案以妻子服药自杀而告终

律师杰罗姆·拉帕波特及其妻子南希·沃赫·拉帕波特·斯坦利为争夺六个子女，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法庭争战，昨晚，年轻有为的母亲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这场悲剧般的子女争夺战终于宣告结束。

遗 书

一名家庭发言人称，上周二下午，哈佛商学院的讲师亚历山大·O. 斯坦利在地处后海湾马尔伯勒街285号的寓所中发现自己三十四岁的妻子自杀身亡，他的妻子是一名极具魅力的社交名媛。

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之际，她将自己六个孩子的困境公布于众，这似乎是她万念俱灰后做的最后一次挣扎。

她的自杀极大地扭转了局势。萨福克遗嘱检验院法官埃德蒙·凯威利做出了对她有利的裁决，但案子上呈到国家最高司法院后，该判决有可能被推翻。

上 诉

她去了位于西罗克斯伯里魁尔街的前夫（前夫是一名律师）家中，提出要探视孩子，但遭到拒绝。

之后，她回到了自己在马尔伯勒街的寓所。

交给法官惠特莫尔的遗书言辞非常尖锐。她的临终请求是希望法官能将孩子的监护权交给她现在的丈夫亚历山大·斯坦利以及她的母亲伊迪丝·沃赫女士，遗书的署名是“南希·沃赫·斯坦利”。

第二封信是写给亚历山大·斯坦利的，上面写着：“亲爱的亚历克斯，我知道我对你要求得太多，你给予了我超乎所求的帮助。请代我照顾孩子们，忘记我吧。我爱你，南希。”

根据法院在7月份做出的判决，斯坦利女士将得到十一岁的玛莎、九岁的艾米、八岁的朱迪·安、七岁的詹姆斯、六岁的杰罗姆和四岁的南希这六个孩子的监护权。

在本周早些时候，拉帕波特上诉要求缓期执行遗嘱检验法院法官凯威利做出的归还孩子监护权的判决，法官惠特莫尔接受了他的上诉。

子女仍归父亲

“缓期执行”使现状得以维持，父亲至少可以暂时享有子女的监护权，直至高等法院全体法官对该案做出最终判决。

谈到前妻的死，拉帕波特说：“她的死让我很难过。希望她已经找到了梦寐以求的那份平静。我为她的母亲和现任丈夫感到遗憾。”

这些文章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和姐姐朱迪一起找到的，在这之后，我一遍遍地阅读《去问爱丽丝》，那是一本死于吸毒过量的少女写的阴暗日记。我沉溺于她的自我毁灭而不可自拔，想到自己的未来也胆战心惊。母亲是在三十四岁时自杀的，所以我担心自己也将被抑郁症所困扰，并预感自己活不过三十四岁。

在我大概十四岁的时候，父亲终于告诉了我一个真相，母亲自杀身亡的前两年里就曾企图自杀过。实际上，在我们自己从图书馆收集的缩微胶片中，我和姐姐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事实。在《美国记录》中，我们找到了一张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看上去要比她那张肖像照年轻得多。她在脖子上随意系了一条运动型丝巾，鼻翼微微上翘，显得精神十足。文章的标题是：服下三大把安眠药。

文章中还附了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中的父亲，浓密的头发梳到了一边，戴着一副老式的牛角框眼镜，穿着深色西服上衣，里面套着一件纤尘不染的白衬衫。“送妻子去医院之后”，这是照

片旁边的文字说明，正好与父亲那阴沉的表情相衬。

母亲在自杀未遂之后找过心理医生寻求治疗。当时，心理医生与病人谈论的还是神经官能症，这是现在的心理医生已经很少使用的一个术语。现在的一些热门电影，比如《三面夏娃》和《壮美的草原》等，都美化了精神分析的作用，尤其是精神分析师阐释孩童时代就存在的心理冲突和缓解焦虑的能力。在母亲的日记中，她说心理治疗所付出的努力是“毫无裨益的……医生把我弄得团团转，而当我走出医生的办公室时，我的困惑甚至比进来之前更多”。她敢于敞开心扉袒露“轰然而至的陌生情感……隐藏于灵魂深处的最可怕的秘密”——她对丈夫之外的另一个人的隐秘欲望。用她的话来说，心理治疗仅仅是“付钱与某个人进行深入交谈”。母亲接受的治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她的自我指责观念，发掘了她内在欲望的意义，却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隐患，但事后的聪明毫无意义。从心理治疗中，她甚至可能找到了一条从原有婚姻中撤退而保证“不让孩子们被抢走”的战略道路。

我常常在想，时至今日，如果母亲还活着，她一定非常理解我的选择。我在想，母亲如果看着我长大成人并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尽到母亲的职责，直到不得不与孩子们分离，她会是什么感觉。作为一个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家，就是母亲所说的那类“必须付钱的听众”，我也常常“把人搞得团团转”，试图以此来驾驭患者因难以承受的损失所造成的痛苦，坚定他们继续前行的决心，并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在独自忍受悲伤。

为什么母亲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我的记忆不能给我提供任何答案，不仅如此，我还对父亲的一面之词有所怀疑。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我精心做好了充分准备，希望去理解母亲的行为。在《自杀剖析》一书中，临床研究者莱斯顿·黑文斯写道，自杀是“在

由各种情况构成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产生的最终通道，而不是由孤立的原因以及单一的时间和地点碰撞出的情节所导致的”。活着的人应该将自杀看待为自杀者宣布免除生者之罪或谴责生者的一种方式。我意识到真相早已跟随死者一起被埋葬，而那些问题将永远挥之不去，因此我曾试图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叙述方式，去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第二章

从未有人告诉过我，悲伤能够使人感觉到恐惧。我并不惧怕，但这种感觉就如同惧怕——同样在胃中痉挛，同样令人不安，同样地喷涌而来。我继续吞咽着内心的悲伤。

——C.S.刘易斯，《卿卿如晤》

我的儿子科里五岁时问我，他的外祖母只是骨头被埋葬在地底下还是连头一起被埋起来了，而我当时上一年级的女儿丽拉则想知道外祖母被埋葬时是否还穿着衣服。我用带着些许不敬的方式告诉他们，他们的外祖母是带着污垢躺在一个盒子里的。我很不愿意说他们的外祖母已经去了天堂或是说一些爱比死亡更为持久之类的话。事实上，我对自己都无法解释她的死亡，更何况是对我的孩子们呢。

在丽拉十三岁的时候，她问我：“你有没有可能会自杀吗？”显然她非常惧怕我给出肯定的答案。我向她保证我绝不会自杀，而且，我还给了她一个拥抱，告诉她我想一直陪伴着她，看着她长大成人。我不希望在她需要依靠的时候她会犹豫是否靠近我，我不想让她担心有一天我会离开她。然而，她直觉上的担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双亲有任何一方自杀的孩子日后选择自杀的概率是没有